

□ 胥慧颖

我是赵磊老师的第四届硕士研究生，在党校读书的3年期间，赵磊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奋斗精神、谦和的处事风格时时感染着我。入学后第一次见面，他就嘱咐我：三年的时间可以将自己的明天与今天拉开很大的距离，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三年的一分一秒；要多读书，勤动笔，稳扎稳打。后来的学习让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精雕细锤炼文章

赵老师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认真”二字。赵老师治学一向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无论是校对文稿还是撰写文章，都再三叮嘱我们做到字斟句酌，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记得我第一次校对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刊物《新战略》时，有很多错误没有找出来，他一个个地指出我的疏忽，还告诫我认真是做学问最基本的要求，“一定要在细节上下功夫，认真说起来简单，但做到不易”。现在，“认真”二字已融入我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颇为受益。

从入学开始，赵老师就有意识地训练每一个学生的写作能力。学术论文、研究综述、报刊文章、内参报告等，赵老师都加以严格训练，让我们学习领悟不同类型文章的写作特点。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找一个小的切入点，做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写出实实在在的“干货”，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最初接触这些议题时，我很茫然，不知道从何下手，写出的文章存在很大问题。赵老师在整体框架、观点提炼甚至遣词造句上都会提出修改意见并反复推敲。最后，他总会把自己就这一议题的写作终稿发给我，让我对照之前的文章，找出不足，引以为戒。3年中，赵老师带我参与了许多科研课题并发表文章，推荐我去中国外文局实习，带领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民族问题若干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体会到做学问的“怡然自得”。考博时在学校的选择上，赵老师告诉我眼光不要



局限于北京的高校，建议我去感受不同城市、不同高校的多元学术氛围，博采众长对未来的发展才更有助益。我由衷地感到是老师引导我发掘自身的学术潜力，带领我逐步实现学术上的点滴成长。

砥砺前行出真知

赵老师大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硕士以及博士转向学习国际关系。在他看来，两个学科在文化上是相通的：“中文需要了解国内最精髓的文化，国际关系则要了解国外最优秀的文化。”一开始，赵老师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冲突与管理领域。2010年至2011年，他挂职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校委委员、校长助理，其间跑遍了宁夏22个区县。此后，他走访英国、

科索沃、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并于2013年出版了《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书中指出国内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其中认同等文化安全因素是重要导火索。由此，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文化软实力，并于2014年出版了《中国梦与世界软实力竞争》一书，指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无法在价值领域形成共振的文化，都是花拳绣腿”。

赵老师是致力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专家，诸多研究报告为今天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如《“一带一路”英文译法应尽早明确》一文的发表比官方译法正式确认要早。他建议“一带一路”不应总和“战略”挂钩，而应在国内强调“建设”、在国际强调“倡议”。《纠正“一带一路”的十大错误认

知》一文中，他提出“‘一带一路’65+”的提法，慎用“桥头堡”“过剩产能”等。2015年5月，赵老师推动成立“一带一路百人论坛”这一网络智库。目前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本年度报告，并成为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上会书籍。

近年来，赵老师愈发忙碌起来，只要有时间就外出调研，“老在路上”成为赵老师的常态。他于2015、2016连续两年出版了两本关于“一带一路”的专著，分别是《“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和《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其中，《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教授，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主要专注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民族冲突管理、“一带一路”建设等。出版著作15部，先后获得中央党校教学优秀奖、科研优秀成果奖，中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称号。

知》一文中，他提出“‘一带一路’65+”的提法，慎用“桥头堡”“过剩产能”等。2015年5月，赵老师推动成立“一带一路百人论坛”这一网络智库。目前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本年度报告，并成为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上会书籍。

近年来，赵老师愈发忙碌起来，只要有时间就外出调研，“老在路上”成为赵老师的常态。他于2015、2016连续两年出版了两本关于“一带一路”的专著，分别是《“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和《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其中，《文化经济学的“一带一路”》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上会书籍，并且翻译成了英文、俄文、阿拉伯文。两部书共近50万字，每一个字都是赵老师一步一步调研“走”出来的。

初心不移显担当

赵老师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简单到极致便是大智，利他到极致就是精品。为此，他几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假期，并总会在第一时间分享他的调研心得。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2016年春节假期刚刚结束，赵老师就赴澳大利亚调研；另一次是2017年2月，春节假期还没结束，赵老师又赴新疆阿拉山口调研。当时的阿拉山口天气非常恶劣，刮着十级大风、下着暴雪，赵老师在机场附近的快捷酒店完成了阿拉山口“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研究要处理好四组关系

□ 赵明昊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他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强调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他在阐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提出，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此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展望未来数十年，“一带一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我们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营造和平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尤其是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过去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机制建设、平台搭建、融资保障等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大的关注和支持。截至2017年5月，我国已与43个国家就共建“一带一路”发布联合声明（公报）。联

合国有关机构、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纷纷与我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充分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议程设置、倡议实施、力量动员、网络构建等能力。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以“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高度概括了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方向、大规划。此外，中国政府还宣布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以带动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力量为“一带一路”作出贡献。特别是，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更为机制化、长效化，中国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

深入。

上述“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定位、新动向、新要求，为如何做好“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启示。笔者认为，“一带一路”研究应聚焦思考如何处理以下四组关系。一是“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的关系，要增强开放性，以互联互通消解和超越“排他性”和“对抗性”，拒绝非此即彼、阵营分立、零和博弈。二是“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关系，不搞“唯规则论”，既推动规则建设，也重视沟通、协商、调解的作用，尽量照顾各方舒适度，维护彼此默契。面对分歧摩擦，既靠规则疏导，也靠关系“润滑”，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相互结合。三是“新机制”和“老机制”的关系，充分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与既有机制之间的对接合作，在此过程中寻求真正符合实际的“最佳实践”。四是“陆丝”和“海丝”的关系，努力弥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对滞后的短板，支持相关国家打造“向海经济”，用“合作性海权”理念应对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实现更有效地陆海统筹。

深度观察

加强国际政治中『人』的研究

□ 韩爱勇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研究是揭示世界战争与和平规律的学问。从逻辑上讲，如果没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个世界也就不会发生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战争，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利益协调乃至利益一致的和平，人的活动构成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从理论上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政治研究应该凸显出人的活动、人的色彩和人文关怀。但当前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却缺少关于“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研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划分。西方学者最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将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划分为国际结构、国家结构和个体三个层次，这一划分奠定了国际政治研究层次分析的基础。在稍后的层次分析演进过程或增或减，基本都沿袭了这个路径。到70年代末，为构建大理论的需要，研究的层次只剩下两个——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体。二是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理论的偏好。体系理论简单地讲，就是从国际结构中寻找国家行为特别是大国行为动机的理论，它的因果关系较为简单，就是结构是造成国家行为的原因。之所以偏好体系理论，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的大国确实是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简约、精炼，是单线条的逻辑关系，这让理论构建变得简单，也可以在实践中对结论加以验证。总而言之，国际政治中不是没有人的活动，也不是说人的活动不重要，更不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到其重要性，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太过多样，人的行为动机有多种原因，以至于无法将这些因果关系统一到一个理论中来，只能将之舍弃。结果即便是国际政治中最宏

大的体系理论，也是干巴巴的缺少了人的“瘦”理论，多元立体的国际政治现象简化成某种单一因果关系的单线条解释。

加强国际政治中的“人”研究，一是在研究层次上要微观化，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群以及其诉求作为一个分析层次。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也就是说，在国家内部所有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现实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不同群体的诉求未必一致，多数与少数、不同文化群体等等，他们利益诉求的差异是客观的。国家是单一的假定其实是基于国内多数民众利益诉求的假定，而忽视少数民众的利益关切。如此一来，分析层次微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要关注国内少数民众及其诉求的研究，这样一来研究议程就包括了五部分：少数民众及其利益诉求分析，多数民众及其利益诉求分析，两种诉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分析，内在张力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国际环境对内在张力的影响。

二是重视中观理论的构建。宏大的体系理论不见人，过于微观的分析难以驾驭众多的变量关系，中观理论可能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方式。它可以假定人群诉求具有一致性，比如对发展、和平、幸福的追求等，这种诉求是以客观资源作支撑的；当诉求的满足与资源的支撑相匹配时不会产生矛盾，反之矛盾产生，而这种矛盾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存在着极好的例子：中国与周边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民众的普遍诉求，中国跨境河流有十四条，这就涉及到跨境水资源的分配问题。虽然水资源分配有国际水法的成文惯例，但是国家发展是动态的，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河流水文条件也会随着气候变

化而变化，水资源的供给量也就随之出现变化。两者相加，当水资源供给出现紧张时，矛盾就会显现出来。这样一来，民众诉求与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变化，就会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术评论